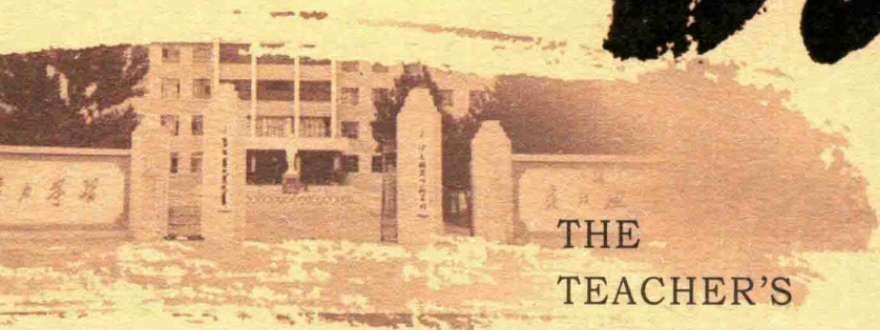




THE
TEACHER'S
SPIRIT

師

梁伯琦 著

在我心中



魂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PRESS

师魂在我心中

梁伯琦 著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师魂在我心中 / 梁伯琦著. — 杭州: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2016. 7

ISBN 978-7-5178-1742-0

I. ①师… II. ①梁… III. ①回忆录—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68625 号

师魂在我心中

梁伯琦 著

责任编辑 任晓燕

责任校对 周晓竹

封面设计 林朦朦

责任印制 包建辉

出版发行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教工路 198 号 邮政编码 310012)

(E-mail: zjgsupress@163.com)

(网址: <http://www.zjgsupress.com>)

电话: 0571-88904980, 88831806(传真)

排 版 杭州朝曦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五象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8.25

字 数 190 千

版 印 次 2016 年 7 月第 1 版 201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78-1742-0

定 价 30.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营销部邮购电话 0571-88904970

再版序

这本书曾于1994年9月由内蒙古远方出版社出版,是当时我作为一个支边知识分子在退休之际向鄂尔多斯人民做的一个汇报。我从内心里感激鄂尔多斯人民,是这里的父老乡亲哺育我成长为“教育战线上活着的罗健夫”。如今时间已过去20余年,我已是年逾八旬的老人了,但我没有停止战斗,仍一如既往战斗在教育战线上——我与夫人赫连素贞经14年的努力,共同主编出版了《陶行知教育思想基础》(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12月出版)。

今天,当年的伊克昭盟师范学校、伊克昭盟教育学院、伊克昭盟电视大学三校联合,已发展成为一所正规的高职院校——鄂尔多斯职业学院。这是鄂尔多斯教育事业历史性的一个飞跃,我从内心里感到欣慰,并愿为她贡献余热。现在这本书转由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再版,在内容上没有做过多改动,仍保持原样,只是对一些错别字和不规范的标点符号进行了修改。这里特别要提出的是,再版中,蒙浙江大学城市学院传媒与人文学院前院长、博士生导师张梦新先生悉心指导,亲自对书中的文字做了严格的审核,改正了不少一般难以识别的错误。张梦新教授深厚的文字功底不仅

令我钦佩,他严谨治学且具有高度的责任感,是我和孩子们学习的榜样。

为什么要再版这本书?

这本书反映了伊克昭盟师范学校从建校初期至 20 世纪 90 年代初 30 余年的历史面貌,真实记录了教师们含辛茹苦的育人事迹。这些看似平凡,而实际蕴含了鄂尔多斯教育艰辛的发展过程。本书在 1994 年出版,许多人读后泪水不禁夺眶而出。书中有什么如此感人肺腑?伊克昭盟师范创建于 1959 年,正值国家困难时期,我是 1960 年秋天调到师范的,我的工作是教全校学生的物理,管理仪器室、实验室,兼理化生地教研组长和学校的电工。1971 年又兼任伊盟体校的体操教练。尽管工作繁多,亦多能胜任。1977 年初,我大腿内侧发现肿瘤,1977 年 4 月 23 日做第一次大部根除手术。术后 10 天,我即骑车去学校上课。尽管伤口不断渗出血水,但我还能坚持上完课。这是我来伊克昭盟 20 年第一次患病,后经化验确诊为恶性肿瘤,立刻转北京、上海、杭州三个肿瘤医院复查,确诊无疑。我急于赶回学校上课,当时自我感觉良好,回来后一切照常。

1978 年底,肿瘤复发了。我坚持工作到课程结束,1979 年 2 月初,立刻转院至内蒙古医院,由著名肿瘤外科医生鲁智做了大部根除手术,伤口由原先的 16 cm 长增加到 28 cm。由于伤口太长,炎症难消,直到两个月后才有好转,我请求回校疗养。回校后我立即又投入工作。一年多以后,肿瘤再次复发了。1980 年 4 月 23 日,在内蒙古医院由夏医生为我做了第三次大部根除手术,伤口长度又延长到 33 cm 了。第三次术后,医生们非常担心,如果再复发,就不能再做手术了,因为右大腿内侧已经没有肉了。他们精心为我设计了根除的治疗方案。第三次术后,采取大剂量放疗。在

病房里,我有许多时间用来学习与备课。接着在1981年、1982年连续两次化疗。在病房里,我仍然可以备课与学习。我没有轻易放弃一分一秒的时间,即使在癌症一次又一次复发的病情危重时刻,我都没有离开过朝夕相处的学生,坚持在第一线为学生授课。

我所患的恶性肿瘤经多次切片化验,确诊为“脂肪型黏液性肉瘤”,是一种极顽固的癌细胞,具有很强的复发能力,其特点是具有黏液性、不易扩散和不易转移。所以,根治的关键是切除的面积要足够大,一点也不能残留癌细胞;然后再加上放疗、化疗等辅助治疗,才可根除。自得病以来,我自信我有一副强壮的身体,能经受大面积切除手术以及超剂量的放疗和化疗。我坚信用科学的治疗方法和科学的生活态度能战胜癌症。我对病情始终持乐观态度。我从未停止过锻炼身体,家庭也未因我的病情而陷入悲观。从发病到今天,已经38年了,我已是年逾八旬的老人了。事实证明,癌症是可以战胜的!今天,可以告慰所有关心我的人,晚年我仍在不懈地致力于中国教育的研究,至今没有停止笔耕。

2015年初夏,学校派人专程来杭州采访我。告诉我,学校拟建造450平方米的校史馆,要收集有关纪念品。我提供了上百件纪念品,包括我所主编的《园丁》《师范科普》《思想教育通讯》《自然科学》《全区中师自然科学教学通讯》《伊盟物理教学通讯》;我历年来编写的讲义资料、教学札记以及其他实物,甚至连中央和地方颁发的奖章也都如数捐赠。有人问我:“你舍得吗?”我回答说:“荣誉不只属于我,也属于学校;这些奖章与其‘失业’在家,不如给它们找个岗位,更能显出它们的价值。”我不愿这些原本光灿夺目的奖章压在箱底黯然失色,希望它们在阳光下光芒四射!《师魂在我心中》展示的就是以往我的这些荣誉和成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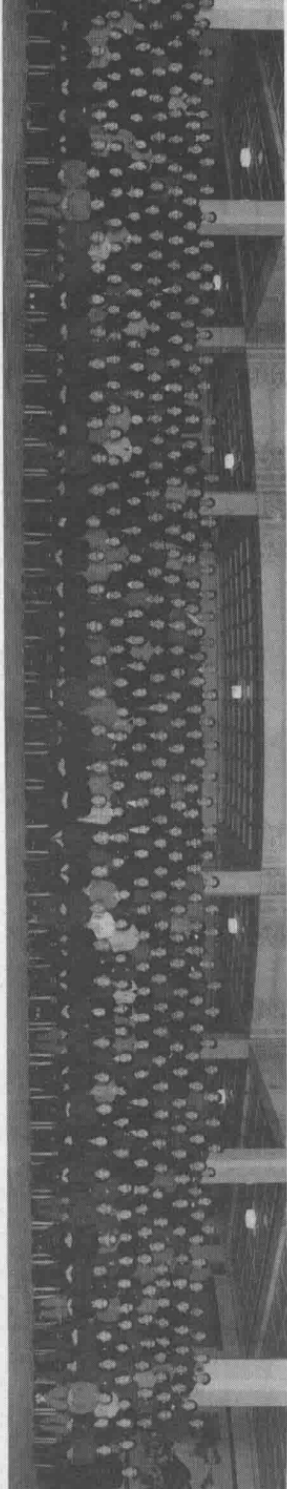
2015年6月,我在鄂尔多斯职业学院和内蒙古师范大学做报

告。许多人向我提出：你年过八旬不拿讲稿做报告讲两小时，为何有如此好的记忆力？为何有这么敏捷的思维？为何还有那么清晰的思路？你为何精力如此充沛，还能做精深的研究？究竟是什么力量支持着你？我想，这一系列问题，只有让《师魂》这本书来回答吧。这是我再版《师魂》的一个原因。

梁伯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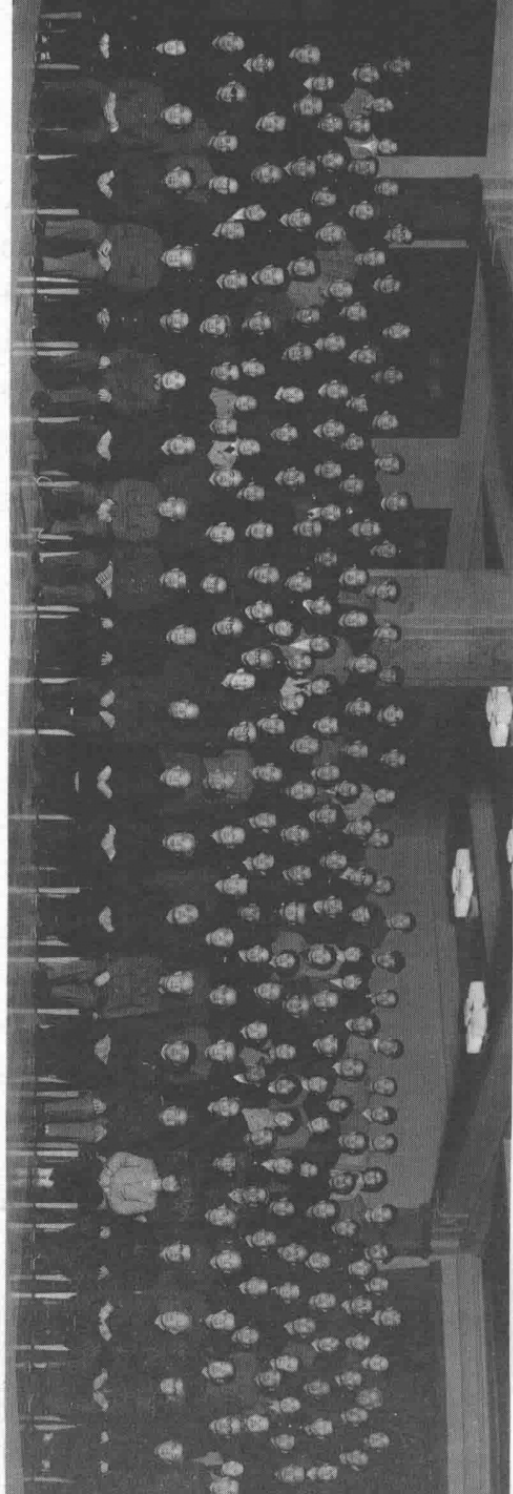
2015年8月于杭州

中央領導同志接見出席全國“五講四美”為人師表活動先進代表會議全體代表合影 一九八三年四月一日



中央領導同志接見出席全國“五講四美”為人師表活動先進代表會議全體代表合影(第三排右起第三人為梁伯璠)

李先念、彭真等中央領導同志會見勞動模範、先進人物時合影 1963.4.26



李先念、彭真等中央領導同志會見勞動模範、先進人物時合影（第三排左起第十人為梁伯琦）

写在前面

1957年8月,我从北京师范大学物理系毕业,志愿来到内蒙古自治区伊克昭盟任教,先后在伊克昭盟中学、伊克昭盟师范等校任教36年。我把毕生的精力献给了鄂尔多斯的教育事业。

风风雨雨的36年,我在农村办过夜校,搞过扫盲,教过小学、初中、高中、初师、中师、师专;先后上过物理、化学、数学、普通物理、自然、英语等十几门课程,教过70余个班级的4000余名学生。

我从小生活在上海、苏州、杭州,1953年我从杭州宗文中学(现杭十中)毕业离开了西子湖。在伊克昭盟时,许多人问我:“你真傻,从这么好的地方来这儿,究竟图什么?”36年匆匆地过去了,我也快退休了。我想,现在可以回答这个问题了。这不仅是回答别人,也是回答我自己。

当我回顾过去的时候,我才发现,每个人都会顽强地按照自己的想法,走完自己的全程,我也不例外。尽管,我这36年坎坷不平,但是任何干扰都没有改变我的初衷。也有人问我:“最后,你得到了什么?”在我看来,任何人活在世上,都是空手而来,空手而去的。因此,我希望能够创造对人类、对社会有用的东西,这也许是最好的财富。

36年来,我一直在想,伊克昭盟人民最需要的是什么,我能为伊克昭盟做些什么。这36年中,伊克昭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伊克昭盟是一块宝地,它有得天独厚的丰富的资源:煤、碱、陶瓷土、天然气……但是,落后的教育、人才的奇缺与丰富的地下资源是极不相称的。由此,我找到了自己的人生位置。尽管我过的是清贫的生活,做的是极平凡的工作,但对改变伊克昭盟的落后面貌,一定会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如今,在伊克昭盟的任何一个厂矿、机关、农村、学校,都有我教过的学生。今天的伊克昭盟,也不是30多年前的伊克昭盟了。与毗邻地区相比,伊克昭盟的变化是巨大的。无疑,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教育的空前发展。

初到伊克昭盟,使人感到这儿确实落后,贫穷偏远。但是我很自信。我坚信,教育能改变这种状况。后来,不少人陆续离开了,但我不仅没有丝毫动摇,反而更加相信,教育改变一个地区的贫穷、落后状况,是一场超级持久战。我意识到,这是历史对我们这代人最严峻的考验,因而需要一种超人的毅力。要做到这一点也不难,只要把人生的“坐标”旋转一下就行,对于我,旋转的角度并不大,因为我从小过着忍辱负重的贫穷生活。

本书记叙了我在鄂尔多斯高原生活工作的36年历程,在我退休之年,这是我向伊克昭盟人民做的一个汇报。

梁伯琦

1993年

目 录 CONTENTS

- 党项摇篮 青藏高原是我家 / 001
- 归附大唐 拓跋赤辞得皇姓 / 006
- 远离战乱 党项两次大迁徙 / 011
- 起兵勤王 拓跋思恭建藩镇 / 015
- 统万城下 李彝超智退后唐兵 / 019
- 夏州内讧 李继捧入朝献五州 / 023
- 联辽抗宋 李继迁受封复故土 / 026
- 攻取灵州 拓跋氏大张雄势 / 031
- 曲线救国 李德明附辽和宋 / 036
- 占领河西 西夏国稳固根基 / 042
- 登基开国 李元昊成就霸业 / 046
- 人造天书 西夏文通行境内 / 051
- 延揽人才 张元、吴昊投西夏 / 056
- 首战告捷 李元昊败宋三川口 / 059
- 银鸽传信 宋军覆没好水川 / 063
- 再出奇兵 长城壕边歼宋军 / 067
- 河曲大战 退避三舍败契丹 / 070
- 诱敌深入 西夏再败大辽兵 / 074
- 为了议和 范仲淹私焚元昊书 / 078
- 讨价还价 咬文嚼字争名分 / 082

难忘老师哺育情

关于家世,我知道的很少。在 20 世纪 20 年代,我的祖父和祖母就从浙江省新昌县烟山来到上海谋生。我父亲共有兄弟姊妹 5 人,他排行老三。父亲是日本纱厂的打包工人,20 世纪 30 年代初与我母亲吕香花结婚。

我生于 1932 年 12 月 21 日,两年后,我有了一个妹妹。不幸的是,在我 5 岁的时候,母亲得肺炎去世了。以后,我们就到了杭州。

我上学比较早,但对学习并不入门,学习成绩总不如别人。当时我也曾苦恼过,为什么比别人笨。大约是在我 11 岁时,我突然对报纸产生了兴趣,虽然那时识字不多,但也能断断续续看下去,知道大概意思。报纸使我开阔了眼界,促进了我的学习。从这以后,我才知道努力学习。

小学时期,我先后上过杭州棋园小学(现海星小学)、苏州第一实验小学、杭州正则小学和恒业小学。恒业小学给我的印象是最深的,虽然只上了一年(1946 年 9 月—1947 年 7 月,六年级),但我至今还记得当时的老师和同学,如陈漱芳校长、方乐琴教导主任、语文教师钱士燮、体育教师周仰之、数学教师王绛雪等;同班同学

有宣菊英、陈越、斯小泉、王文浩等。教师都教得很认真，对我们的管教也很严。1947年，我考入杭州宗文中学。当时，杭州有许多中学，为什么我偏偏选择了宗文呢？那时我只有14岁，究竟是什么吸引了我？是这所学校的“古老、质朴”对我产生了吸引力。从1947年至1953年间，宗文给我的印象是很深的。至今我还能想起当年曾教过我的每一位教师，他们的形象、言谈举止，好像石头上的刀刻一样，永远不会消失。

沈平一老师在“星带阁”（假山）上一间小音乐教室里，给我们教视唱，他那洪亮的嗓音至今还萦绕在我的脑海里。我第一次从沈老师那里知道冼星海、聂耳、贝多芬、莫扎特。沈老师还是一位兼通美术教育的老师。他那娴熟的技巧、非凡的才能，令我钦佩。后来我虽然没有成为音乐家和画家，但他那严谨的治学态度、高超的教育技巧、诲人不倦的精神，对我后来的从教生涯影响至深。在我的青少年时期，有幸遇到那么多的良师，刘佩萱、胡敬珍、汪玲燕、周觉昧、俞观瀛、俞大雄、周锡忠、金祖慈、高骏声、韩士叔、沈如虹……他们那种对教育事业执着的追求，似烈火般地熏陶了我这稚嫩的心灵。可以说，宗文是一个拥有众多优秀教师的古老学府。1806年它是一个宗文义塾，1887年改成宗文中学堂（校），至今已有185年的历史。

我的家境贫困，常常交不起学费。免了学费，还有杂费，我还是交不起，只好打个欠条，或者靠同学的资助。当我勉强挣扎到初中二年级第二学期时，1949年5月3日，杭州解放了。之后，我一直靠助学金维持学业。但是，1951年冬，我突然患全身神经末梢炎，全身表皮失去知觉，行动极度艰难。尽管这样，我还是努力学习。正当我处于困境时，班主任王斯琴老师让我每天去他家吃一顿丰盛的午餐。将近一年的照顾，终于使我虚弱的身体得到了恢

复。老师这种无微不至的关怀，使我免遭厄运。

杭州解放，使我获得了新生，把我从苦难的深渊中拯救出来，也使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了生活的希望，我更加努力、更加如饥似渴地学习知识。那时，我白天在宗文上课，每周一、三、五晚上又到浙江省俄专夜校学习两小时，我坚持了3年。俄专夜校的学员都是机关干部，只有我一个是在校生，我的家离宗文中学较远，夜校又在宗文附近，所以我不能回家吃饭，这件事被同班学员、省粮食厅的干部王力生知道了，每一次夜校散学，他就请我到饭馆吃一碗阳春面。他知道我家贫好学，所以常常给我十元八元的零花钱。

我有很多朋友，像邻居李士义。他每个星期总要请我吃顿丰盛的午餐。老李是一家药店的职员，他喜欢学俄语，更爱同我探讨哲学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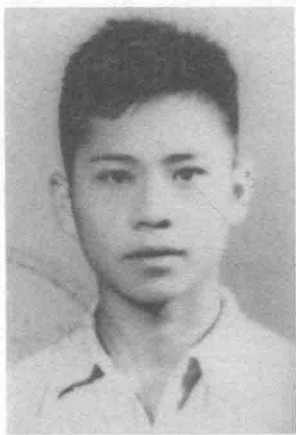


2016年于西湖柳浪闻莺

那时,我的衣着比较破烂,不少同学拿半新的衣服支援我。有的同学中午在学校起伙,把自行车借给我骑。有一段时间,家里揭不开锅,有一位小学同学王文浩,他家开一个小饭铺,他让我中午去他那里吃,只收五分钱。从小学到中学,曾有许多同学、老师、邻里和朋友,在我艰难的时刻,向我伸出了友谊之手,没有他们这种无私的援助,我是很难完成学业的。

离开宗文中学后,我常惦记着哺育我成长的母校。在这里,我度过了青少年时最艰难的一段日子,是崔炳章校长宽大仁慈的胸怀,老师们慈父慈母般的关怀,使我走上了人民教师庄严的讲台。今天,我已在祖国北疆从教 36 年了,在这风风雨雨漫长的岁月里,我虽历经坎坷,但宗文的精神——崇高的“师魂”时刻都在激励自己。爱因斯坦曾对教育下了这样一个定义:“如果一个人忘掉了他在学校里所学到的每一样东西,那么,留下来的就是教育。”(《论教育》)

的确,母校不只教给我知识,而且给我留下了比知识更加珍贵的东西,那就是“质朴、诚实”。



1953 年高中毕业照

1953 年,我高中毕业,当时我报的志愿是北京大学哲学系、中文系、俄罗斯语言文学系。那时,高考录取名单都公布在全国各大报纸上。这一年发榜较晚,9 月下旬,在省图书馆阅览室里,人挤得满满的,我没有找到自己的名字。第二天,王力生从上海给我寄来一张报纸,我才知道被录取到北京师范大学物理系。临走时,他给了我 36 元钱,并为我准备了毛巾、牙膏等生活用品。

我很高兴。第一,我终于彻底摆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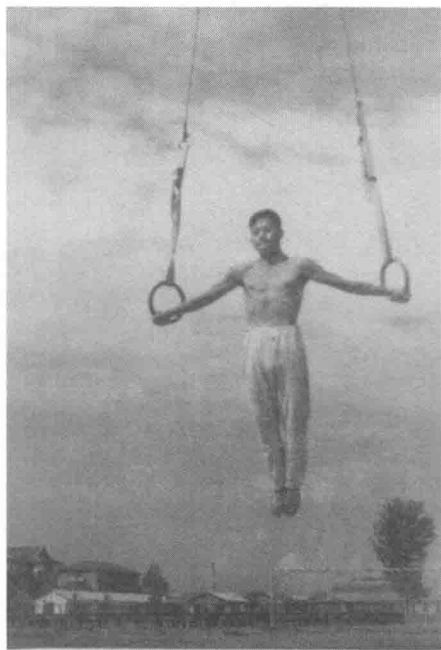
了贫穷的困扰；第二，首都是我向往已久的理想之地；第三，北京师范大学是一所历史悠久的著名的高等学府。但我苦恼的是，我失去了学习上的优势。我多年来爱好文学、外国语和哲学。中学毕业时，我已准备好学习两种外文（英语和俄语），我立志终身从事文学、哲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和翻译。这一下子，我多年的努力付诸东流了。但总的讲，喜多于愁，我还是高兴地启程了。

我记得，1953年的北京还是一个古色古香的城市，喧闹的有轨电车，别有北国风味的小吃到处都有，胡同小巷里尽是四合院。一到北京师范大学，吃的第一顿饭是鸡蛋炒米饭，还有虾米汤。

上大学后，我听到的第一个报告，是中国的保尔——吴运铎同志给我们做的“把一切献给党”。这是我有生以来听到的第一个关于人生的报告。在这之前，我根本没有想过人为什么要活着，更没有

想过怎样活着才有意义。这个报告好像一种强兴奋剂注入了我的血液，使我的生活一下子沸腾起来了。我开始思考：新中国成立使我摆脱了困境，生活发生了转机，有幸能跨进最高学府求学。这一年又是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我们是新中国的第一代大学生，责无旁贷肩负的历史责任，就是要为新中国的建设努力学习。

然而，我面临着一种新



1957年5月摄于北师大操场（沈鸿声 摄）